

.....

转型经济中后发企业创新能力的 追赶路径和机理：所有权视角

江诗松 著



科学出版社

转型经济中后发企业创新能力的 追赶路径和机理：所有权视角

江诗松 著

本书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经济中后发企业创新能力的追赶路径和机理：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编号：71202122）、“多维技术空间机遇下新兴经济企业成长路径：商业模式的视角”（编号：71302094）；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编号：WD70BSM）；武汉大学“985”工程项目的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转型经济的关键情境因素——企业所有权形式为切入点,探索不同所有权形式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议题。具体的研究问题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同所有权后发企业在创新能力追赶路径和机制上存在什么差异,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采用案例研究、仿真研究、大样本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本书深度剖析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作为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过程和机理,并揭示其中关键的制度情境权变因素。

本书突出中国战略管理和创新管理情境,提出的研究问题扎根于中国独特的制度和产业发展特色;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在掌握国际主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并试图在全球管理学界的坐标中定位自己的贡献;采用的研究方法多样化,不仅采用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还运用定量研究和仿真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中,又采用单案例研究和比较案例研究方法。

本书适合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国际管理、产业政策、科技政策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经济中后发企业创新能力的追赶路径和机理:所有权视角/江诗松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3-044045-7

I. ①转… II. ①江… III. ①企业创新—研究—中国 IV. ①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9013号

责任编辑:徐 倩 / 责任校对:朱光兰
责任印制:李 利 / 封面设计: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1/4

字数:247 000

定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问题	5
1.3	研究设计	7
1.4	章节安排	10
2	文献综述	12
2.1	相关理论文献综述	12
2.2	相关议题文献综述	27
2.3	相关方法文献综述	43
3	比较案例研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追赶的比较	55
3.1	引言	55
3.2	理论背景	56
3.3	研究方法	59
3.4	结果	62
3.5	结论和讨论	77
4	仿真研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追赶的动力学	83
4.1	引言	83
4.2	理论背景	84
4.3	研究方法	86
4.4	模型结构	90
4.5	仿真分析	96
4.6	结论和讨论	105
5	大样本统计研究：国有股权对创新能力追赶的影响	108
5.1	引言	108
5.2	理论背景和假设发展	109
5.3	研究方法	113
5.4	结果	118
5.5	讨论和结论	123
6	单案例研究：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追赶和制度环境的共演	127
6.1	引言	127
6.2	理论背景	128
6.3	研究方法	131

6.4	主要发现	134
6.5	讨论和结论	147
7	结论和展望	151
7.1	结论	151
7.2	理论贡献	152
7.3	管理意义	156
7.4	政策意义	156
7.5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157
参考文献		159
附录 1		184
附录 2		186
附录 3		188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政府借鉴其他成功追赶的东亚后发国家(如日本、韩国)的经验, 基于强大的保护壁垒, 着手培育在中高技术产业树立坚实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国务院相继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支持政策, 如 1987 年《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 1991 年《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请示的通知》, 试点企业包括 55 家国有企业; 1997 年《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试点企业包括 60 家国有企业和 3 家民营企业(万象集团、万杰集团和红豆集团)。到 20 世纪末, 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Nolan 及其同事(Nolan, 2002; Nolan and Zhang, 2002)指出的, 这个计划存在不足。与此相反的是, 华为、联想、TCL 等“体制外企业”却成为技术能力建设的桥头堡(Cai and Tylecote, 2008)。Nolan (2002) 这样描述中国政府培育大型企业的产业政策:

“在二十年的改革后, 相对于国际巨头来说, 中国大企业的竞争能力仍然极其弱小, 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 如航空、电力等复杂装备产业、制药产业, 在中等技术产业, 如石油和石化、汽车组装和汽车配件产业也是如此。然而, 即使对于更低技术的产业, 如钢铁和煤炭, 在一些高附加值的细分市场中, 和世界领先企业同样存在显著的差距。以销售额、利润和研发来衡量, 那些打算在全球竞技场竞争的中国领导企业仍然落后于全球领先者。更重要的是, 比起产业政策实施肇始的二十年前, 中国的领先企业进一步落后于全球领先者。”

如果说中国加入 WTO 前政府培育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不足之处仅仅出现在若干西方文献中而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注意, 那么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曾出现的问题则是国内最夺人眼球的财经故事题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2006)通过对汽车企业和业内人士的访谈认为, 国有汽车企业及其合资公司近三十年的发展不仅没有学习到任何核心技术, 而且放弃了原有的产品开发平台, 成了跨国汽车公司的装配厂。相反, 有些民营汽车企业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不仅频繁地引入新的自主品牌汽车, 还在若干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如“世界上唯一受专利保护的汽车类主动防御技术——BMBS 技术”(易车网, 2008; 张伦维, 2008)。研究报告提交后, 引起

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路风（2006）回忆道：

“在完成了科技部研究室委托的原定任务后，我们于2004年2月提交了长达11万字的报告——《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在内部印发。报告迅速流传，并于3月下旬被财经媒体《商务周刊》长篇摘要刊登，然后这个报道又被闻风而动的新浪网刊登。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在社会舆论上，这个报告都引起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在那年的春天掀起一场‘风暴’。一时间，媒体纷纷转载，采访不断。”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只有民营企业才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寄托者？另一种猜测是，也许人们对国有企业过多的指责只是反映了某种刻板印象而已。事实是，从1978~1984年的“扩权让利”，到1984~1992年的“承包经营”、1992~2002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如今的“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国有企业发展成果显著。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Xu（2010）的间接统计，2008年年末，中国共有15.4万家国有企业，占有企业数目的3.1%，而占总资产的比例达30%。不仅如此，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环境显著变化，国有企业选择采取更具企业家精神的战略，促进企业成长（Tan, 2005, 2007; Tan and Tan, 2005）。经验证据还表明，“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垂死的恐龙而是生机勃勃的发电机”（Ralston et al., 2006）。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的观察，近年来，中国企业界的“国进民退”^①主要表现在：第一，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性领域中，出现了民营资本的“挤出现象”，其中以山东日照钢铁案和山西煤炭整合案^②最为引人注目；第二，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有资本几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订单，“铁公基”^③成为国企的专享盛宴；第三，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第四，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了国企设置准入门槛、购并等景象。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培育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失败，到21世纪初汽车产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绩效差异，再到新一轮的“国退民进”趋势，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迅速增长的“硬币另一面”。深刻剖析这些现象，有助于提供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同所有权形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动态竞争和能力建设过程的完整图景，并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和长期动力机制。

① “国进民退”指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某领域国有资产进入而民营资本被迫撤出现象。

② 山东日照钢铁案指2008年作为国有企业的山东钢铁集团收购作为民营企业的日照钢铁；山西煤炭整合案指2009年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矿产资源整合工作，首当其冲的是浙江民营投资者。

③ “铁公基”是指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1.1.2 理论背景

1. 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理论的重要性

第一, 忽视制度因素的主流理论在非发达市场经济情境下应用面临挑战。相关研究很早就已经证实了这个问题。Kiggundu 等 (1983) 回顾 1956~1981 年发表的 94 项研究成果, 指出主流组织和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应用存在两个有趣现象。一是, 关注技术核心 (组织任务和技术) 的研究将主流理论应用在这些国家中最有可能发现不显著问题。二是, 关于组织及其更大环境关系的研究将主流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时, 更有可能发现严重的困难, 因而需要重大调整。换言之, 制度不仅仅是背景条件 (Oliver, 1997; Peng and Heath, 1996), 而是“直接决定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战略并创造竞争优势中所拥有的计谋” (Ingram et al., 2002)。转型经济和发达经济之间制度框架的重大差异使学者们更加关注产业和资源因素以外的制度因素 (Chacar and Vissa, 2005; Doh et al., 2004; Hafsi and Farashahi, 2005; McMillan, 2007)。

第二, 转型经济为制度理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深刻的转型。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制度并非同步转型。这为通过制度观解释企业绩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Peng, 2002)。具体而言, 转型经济的研究环境允许人们改变制度情境。反之, Scott (1995) 指出, “如果所有的例子都嵌入同样或相似的制度中, 辨析制度对社会结构和行为的效应, 即使不是不可能, 也是非常困难的。”正如 Tan 等 (2007) 所言: 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是一个独特的试验, 它可以解决更难同时也更有趣的议题 (Powell, 1996)。

对于研究转型经济的战略管理, 以及亚太地区的知识管理和创新战略, 制度理论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理论视角 (Hoskisson et al., 2000; Lu et al., 2008)。例如, Hoskisson 等 (2000) 强调在转型经济情境下, 制度理论相对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观的优先角色, Lu 等 (2008) 分析制度环境在知识管理和创新过程中至少扮演三种角色, 也可以称为制度影响知识管理和创新的三种机制。首先, 知识必须被认为是合法的, 也必须和制度要求相契合。其次, 在某种程度上, 知识本身是制度依赖的, 很难将知识从制度环境中分离。最后, 知识创造、传播和再配置的效果和效率部分取决于制度基础设施, 如知识产权体制。

2. 基于后发企业贡献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的潜在机会

在后发企业情境下之所以能够发展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 一方面是因为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自身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和后发企业客观上提供的机会有关。资

源观是战略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从资源观出发，企业在资源、能力、禀赋上是异质的。能够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资源的特点包括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Barney, 1991）。资源观存在两个不足。一是，资源观是静态的。尽管资源观强调企业特定能力和资产以及隔离机制的存在是企业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Penrose, 1959; Rumelt, 1984; Teece, 1984; Wernerfelt, 1984），但并没有试图去解释隔离机制的性质，而正是这些隔离机制使持续的创业租金和竞争优势得以体现。二是，资源观难以解释企业在资源很少的条件下如何开始创造竞争优势，或者如何压倒位者的优势（Mathews, 2002）。

动态能力观是资源观的延伸。动态能力是企业为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而整合、建设和重构内外部能力的才干（Teece et al., 1997）。和传统资源观不同，动态能力观的基本分析单元是过程、定位和路径（Teece et al., 1997），而非资源。企业资产定位及其演化和共演路径塑造了组织过程，进而解释企业动态能力及其竞争优势的本质。动态能力观虽然提供了组织能力发展的逻辑（Teece et al., 1997），但在概念基础和经验研究上都招致诸多批评（Barreto, 2010; Wang and Ahmed, 2007）。例如，Barreto（2010）认为动态能力的概念模糊，使人困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套套逻辑（tautology）。由于动态能力的操作化问题，动态能力的经验研究还较缺乏，并且有限的经验研究在研究设计上主要是截面设计（Danneels, 2008; McEvily and Marcus, 2005）而非纵向设计，因而很难真正识别出动态能力构念的因果逻辑。

后发企业是面临技术和市场双重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Hobday, 1995a）。后发企业成功的早期解释关注外部因素，如低工资成本优势、政府支持，甚至运气。如果后发企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那么这些解释就很难成立了。对后发企业的成功更加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并内部化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Mathews, 2002）。在解释后发企业竞争优势时，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的不足更加明显，同时通过考察后发企业来优化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存在很大机会。例如，Mathews（2002）在研究后发企业竞争优势时构建了联结、杠杆、学习（linkage, leverage, learning）的3L框架，从而修正了传统资源观。和传统企业资源观使用的标准不同，最容易成为后发企业联结和杠杆的目标资源是那些最不稀缺、最容易模仿和转移的资源。

3. 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情境化

组织和管理研究的情境化要求并非是针对中国管理研究提出的。2001年，Rousseau和Fried（2001）在“*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上发表了一篇编辑社论，标题为“地方、地方、地方：情境化组织研究”（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contex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esearch）。他们解释，写这篇

社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组织研究领域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这使社会科学模型从一个社会应用于另一个社会越来越困难；二是，日益多样化的工作和工作环境将显著改变员工和组织之间的因果动力学。这篇社论虽然鼓励对理论和方法的情境化，但仅仅是针对组织行为的研究，而非一般管理研究。

然而，中国管理研究“情境化不足”的问题似乎更为严峻，绝大多数的中国管理研究倾向于利用现有的理论和构念（Li and Tsui, 2002），Tsui（2007）所指的“深度情境化”或者发展新的情境理论则较少。Tsui 等（2004）分析了 106 篇发表于 2000 年 1 月~2003 年 6 月聚焦中国的组织研究，发现只有两项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

Tsui（2004）从全球管理知识的现状角度提出全球管理知识的贡献者主要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北美和西欧）的学者，应鼓励在新的情境下开展高质量的本土研究。除了情境自由性研究外，她将情境敏感性研究分成两类，即情境嵌入性研究和情境特定性研究。她认为这三种研究是对全球管理知识的深化。两年后，她又在“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上发表编辑社论：“中国管理研究的情境化”（Tsui, 2006）。该文对情境化问题进行跨学科讨论，并论述了情境化研究的各个要素，包括现象的情境化（从“由外而内”到“由内而外”）、理论的情境化（从“应用”到“创造”）、测量的情境化（从“翻译”到“本地”）以及方法论的情境化（从“打磨旧的工具”到“开发新的工具”）。

关于理论和情境的关系，目前最系统的分析是 Whetten（2009）的研究。响应最近理论界对情境敏感性研究的呼吁，Whetten（2009）通过系统检验理论和情境之间的界面，提出跨情境理论化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情境化的理论（情境嵌入理论）与情境的理论化（情境效应理论）两个概念。第二个维度是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s of theory）与对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theory）。结合这两个维度，他提出四种跨情境研究，分别为情境化组织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 of contextualized organizational theory）、对情境化组织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 to contextualized organizational theory）、情境效应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 of context effects theory）、对情境效应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 to context effects theory），并探讨四类研究的问题、目的、方法和结果。对于开展跨情境理论化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处在新的研究情境中，同时希望深化主流理论的学者，Whetten（2009）为其克服研究障碍提供了具体建议。

1.2 研究问题

转型经济后发企业能力追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追赶和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战略的关键要素。关注该议题的学术研究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

很多文献探讨了这个问题，并总结后发企业追赶的成功路径和模式（Arthur and Lawrence, 1977; Bell and Pavitt, 1993; Cho and Lee, 2003; Ernst and Kim, 2002; Fan, 2006; Hobday, 1995a; Hobday, 2005; Kim, 1980; Mathews, 2002; Mathews and Cho, 1999; Wei et al., 2005）。另外，最近十几年来，后发企业特别是新兴经济和转型经济的后发企业呈现出新的特征，包括面临的环境变化（如全球化的推进）以及自身的变革（如私有化和去规制化）。考察新形势下后发企业的发展路径有助于解释这些经济体迅速发展的微观机制。

尽管现有的关于后发企业的文献有助于了解其获得创新能力的路径，但仍然存在几个研究缺口。

第一，没有考虑转型经济情境。由于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率先实现经济发展，在早期，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后发企业（Cho et al., 1998; Hobday, 1995a; Hobday, 2005; Hobday et al., 2004; Kim, 1980; Kim et al., 1987; Lee and Lim, 2001; Mathews, 2002; Mathews and Cho, 1999; Park and Lee, 2006）。例如，Kim（1980）提出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发展的三阶段模型、Mathews 和 Cho（1999）研究的后发企业技术学习模型、Mathews（2002）提出的后发企业 3L 追赶框架、Hobday（1995a）提出的出口导向企业的学习机制、Lee 和 Lim（2001）发现的三种追赶路径等。然而，这些文献没有探讨转型经济制度特征在后发企业创新能力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因而限制了这些研究在转型经济情境下的应用。近年来，关于中国后发企业学习和追赶的文献日益涌现（Arvanitis et al., 2006; Fan, 2006; Guo, 2008; Li and Peng, 2008; Liu et al., 2006; Minagawa et al., 2007; Mu and Lee, 2005; Wei et al., 2005; Xie, 2004; Xie and White, 2004, 2006; Xie and Wu, 2003）。这些文献有助于理解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的学习和追赶过程。例如，Xie 和 Wu（2003）指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学习过程和其他东亚国家企业存在差异；Wei 等（2005）提出后发企业技术能力追赶的概念框架；Mu 和 Lee（2005）对 Lee 和 Lim（2001）技术学习和追赶的模型进行修正；Fan（2006）强调通过创新能力进行追赶的重要性。然而，尽管这些研究都是在中国的转型经济情境下开展的，但几乎没有研究明确地分析转型经济的情境因素，如所有权、制度转型等。也就是说，这些研究的结果都属于情境嵌入理论而非情境效应理论（Whetten, 2009）。因此，这些研究难以回答究竟是什么情境因素导致中国后发企业学习和追赶路径呈现某种独特性的问题。

第二，没有考虑异质性因素。由于这些文献仅仅关注成功追赶的后发企业，事实上假定后发企业是同质的（Li and Kozhikode, 2008; Wei and Jiang, 2009），忽视了不同类型的后发企业可能具有不同的资源特点，从而对创新能力发展路径产生影响。正如 Li 和 Kozhikode（2008）所言：“现有研究很少注意到

追赶过程中企业层次的异质性。留下的紧迫问题是,后发企业在追赶过程中存在什么差异,这种差异的意义何在?”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所有权形式差异是后发企业异质性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所有权的多样性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情境因素之一(Li and Peng, 2008; Peng and Luo, 2000; Tan, 2007)。“比起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产生了更多样性的组织(所有权)形式”(Walsh et al., 2009)。战略管理文献表明,不同所有权企业具有不同环境战略架构(Tan, 2002),属于不同的战略集团(Peng et al., 2004)。因为“创新嵌入于其他经营过程并由企业战略引导”(Hobday, 2005),企业战略不同必将导致企业创新过程和能力不同,然而绝大多数后发企业创新研究很少关注所有权议题。在转型经济背景下,考察所有权对后发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研究问题。

第三,缺乏一致和明确的理论基础。现有文献将后发企业创新和追赶视为一个孤立的过程(Hobday, 2005)。Dutrenit (2004)认为,聚焦于后发企业的文献一直关注技术学习和技术知识累积而非技术和组织因素的互动。然而,一些组织和制度因素确实在技术知识的创造中扮演重要角色,分析创新能力追赶过程,仅仅关注技术知识累积过程显然过于狭隘。另外,这些文献很少和主流战略管理理论对话(Dutrenit, 2004; Mathews, 2002)。Dutrenit (2004)通过回顾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文献和西方前沿企业资源观文献,发现两个文献支流相互隔离。Mathews (2002)认为战略管理的概念工具箱(如资源杠杆、企业间联系、网络优势、合并能力等)很少应用在后发企业中。

基于以上论证,本书以转型经济的关键情境因素——企业所有权形式为切入点,探索不同所有权形式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议题,进而明确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同所有权后发企业在创新能力追赶路径和机制上存在什么差异?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具体而言:

- (1)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路径和机制存在什么差异?
- (2)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创新能力追赶过程中如何交互影响?
- (3) 国有股权在什么条件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创新能力追赶绩效?
- (4) 政府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追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1.3 研究设计

1.3.1 技术路线

本书基于对现实背景的观察和提炼、相关理论背景的掌握以及现有研究缺口的识别,提出若干相关的研究问题,并分解为四个子研究(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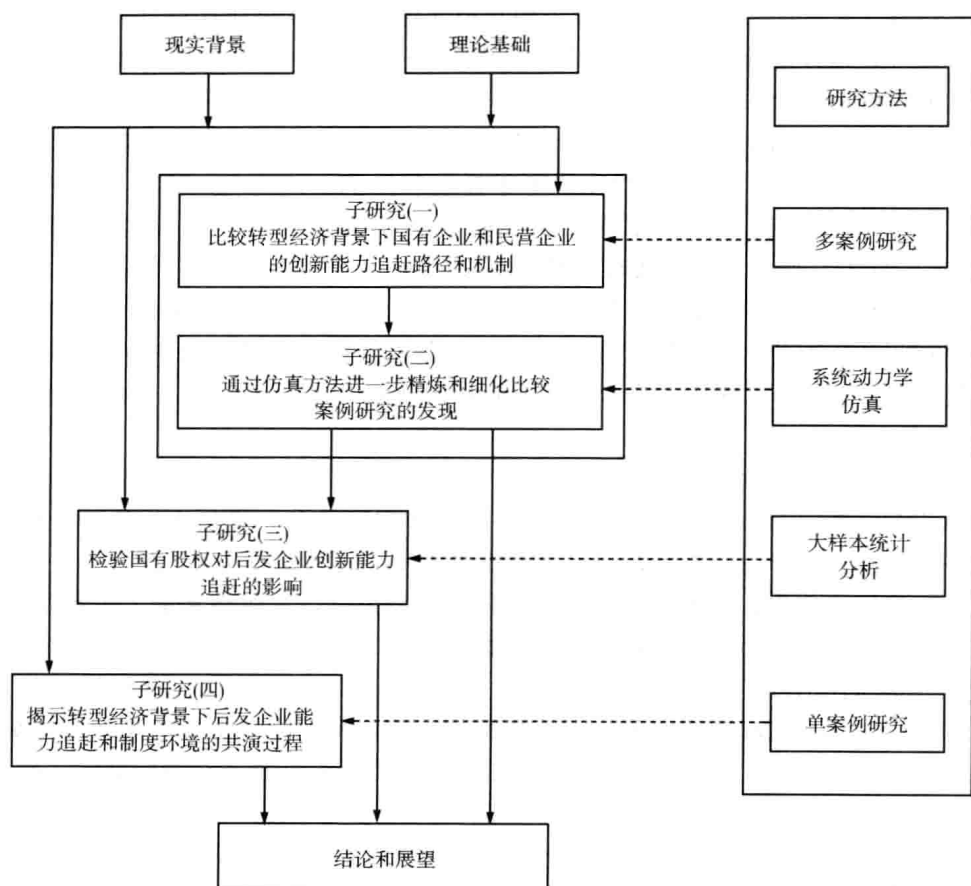


图 1.1 本书展开研究的技术路线

子研究一的目的是比较转型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路径和机制。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一家国有企业和一家民营企业近三十年企业发展史的纵向考察，追踪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路径，识别该过程中涉及的关键影响机制，提出整合的过程模型。

子研究二通过系统动力学仿真方法进一步精炼和细化比较案例研究的发现。根据比较案例研究发展出整合过程模型，通过系统动力学软件 VENSIM 5.7 进一步发展该整合过程模型。具体目的是探索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民营企业进入时机、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可见度窘境，以及政府政策导向延迟时间如何随时间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追赶。

子研究三使用大样本统计方法，检验国有股权对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转型的调节效应。通过对中国 366 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从高管对

企业的特定理解的角度,考虑跨国公司联结的权力依赖逻辑和嵌入性逻辑,探索后发企业国有股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此外,鉴于转型经济的制度动态性,考察制度转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子研究四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一家民营企业为例,揭示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能力追赶和制度环境的共演过程,目的是在前三个子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描后发企业的能力追赶路径。

最后是本书的结论和展望部分,目的是总结、综合、整合各子研究结论,识别理论贡献以及管理、政策含义,承认研究局限,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1.3.2 研究方法

1. 混合研究方法

混合研究方法是混合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方法。本书既包括作为质性研究的案例研究(子研究一和子研究四),也包括作为量化研究的仿真研究(子研究二)和统计检验(子研究三)。在使用混合研究的策略中,本书同时包括顺序法和并行法两种形式。具体而言,作为案例研究的子研究一和作为仿真研究的子研究二采用的是顺序性探索策略(sequential exploratory strategy)。另外,作为案例研究的子研究一、作为统计检验的子研究三,以及作为案例研究的子研究四,采用的是并行三角互证策略(concurrent triangulation strategy),目的是使用不同方式来对结果进行证实、交叉效度分析或确证。

2. 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包括单案例研究方法和多案例研究方法。在子研究一中,由于从所有权视角分析中国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的研究有限,因而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根据多案例研究选择极化类型(polar type)的建议(Eisenhardt, 1989b),选择中国汽车产业一家国有企业(上汽集团)和一家民营企业(吉利集团)作为案例研究企业,对其近三十年的企业发展史进行纵向考察,包括对公司内部人和产业专家访谈,到公司实地参观,收集公司内部文档,浏览公司网站、年报、媒体新闻以及相关出版著作等,经过严谨的数据分析,最后得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追赶的一系列命题和整合的过程理论模型。在子研究四中,为了进一步刻画后发企业能力追赶和制度环境的共演过程,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中国汽车产业一家成功追赶的民营企业(吉利集团)作为案例研究企业,对其近二十年的企业发展史进行纵向考察,最后提出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能力追赶和制度环境的共演模型。

3. 仿真研究方法

为了进一步精练和细化子研究一的发现，子研究二基于子研究一发现的文本分析，构建国有和民营两类异质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动力学的正式数学模型，其中包含从后发企业追赶到政府政策导向的反馈效应，并首次尝试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基于 VENSIM 5.7 软件对该模型进行仿真和实验。具体而言，仿真分析考察了民营企业进入时机、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可见度窘境，以及政府政策导向延迟时间等变量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追赶动力学中扮演的角色。

4. 统计检验方法

子研究三检验了中国后发企业国有股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通过对 2008~2009 年 366 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从高管对企业的特定理解的角度，考虑跨国公司联结的权力依赖逻辑和嵌入性逻辑，探索后发企业国有股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此外，鉴于转型经济的制度动态性，考察制度转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由于专利因变量属于计数变量，回归估计方法采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由于与跨国公司联结变量属于二分变量，回归估计方法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方法。

1.4 章节安排

本书共分 7 章，分别是绪论、文献综述、比较案例研究、仿真研究、大样本统计研究、单案例研究，以及结论和展望。在第 1 章绪论中，首先提炼研究的现实背景，概览相关理论背景，并识别出现有文献的研究缺口，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研究问题。其次描述本书的研究设计，包括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最后总结本书的贡献和章节安排。

在第 2 章文献综述中，综述相关理论（包括资源观、动态能力观、制度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相关议题（包括转型经济和所有权、后发企业及相关概念、后发企业能力追赶的内容、过程 and 情境），相关方法（包括混合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仿真研究方法），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方法基础。

在第 3 章比较案例研究中，为了比较转型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路径和机制，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一家国有企业（上汽集团）和一家民营企业（吉利集团）近三十年的企业发展史进行纵向考察，追踪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路径，识别该过程中涉及的关键影响机制，并提出整合的过程模型。

在第 4 章仿真研究中，为进一步精练和细化比较案例研究的发现，采用系统

动力学仿真方法，在比较案例研究得出的整合过程模型基础上，通过系统动力学软件 VENSIM 5.7 建立计算方程，并检验计算方程的合理性和稳健性，然后通过实验进一步发展该整合过程模型。具体目的是探索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民营企业进入时机、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可见度窘境，以及政府政策导向延迟时间如何随时间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追赶。

在第 5 章大样本统计研究中，使用大样本统计方法，检验国有股权对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转型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对中国 366 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从高管对企业的特定理解的角度，考虑跨国公司联结的权力依赖逻辑和嵌入性逻辑，探索后发企业国有股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此外，鉴于转型经济的制度动态性，考察制度转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在第 6 章单案例研究中，为了进一步刻画后发企业能力追赶和制度环境的共演过程，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一家民营企业（吉利集团）为例，对其近二十年的企业发展史进行纵向考察，提出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能力追赶和制度环境的共演过程。目的是在前三个子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描后发企业的能力追赶路径。

在第 7 章结论与展望中，总结本书各研究结论，讨论本书的理论贡献，以及管理和政策意义，在承认研究存在局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2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相关理论文献综述、相关议题文献综述以及相关方法文献综述。相关理论部分综述本书子研究应用的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制度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相关议题部分涉及本书的一些关键词，如转型经济和所有权、后发企业、后发企业追赶的内容、过程和情境。相关方法部分综述本书所采用的混合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以及管理学较少应用的仿真方法。

2.1 相关理论文献综述

2.1.1 资源观和动态能力观

1. 资源观

资源观是战略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资源观将企业视为一个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有两个基本假设（Barney, 1991）。第一，资源观假定同一产业或集团内部的企业在控制的战略性资源上可能不同。第二，资源观假定这些资源在企业间可能不是完全流动的，因而异质性可以长久持续。资源观是明显的简化论。与简化论相对的是整体论，后者将企业视为具有复杂反馈控制机制的有机体（Kraaijenbrink et al., 2010）。

虽然早有文献指出组织资源非常重要（Penrose, 1959），但企业资源观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成形（Wernerfelt, 1984）。当时的主导框架聚焦组织外部因素，如Porter（1980）五力模型，但资源观的发展逐渐使焦点转向组织内部（Hoskisson et al., 1999）。1991年出版第一个致力于资源观的“Journal of Management”专刊标志着资源观已经从一个初生的理论演化为最具有潜力和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1991年后，资源观在战略管理和相关学科内部迅速扩散，同时争议不断。1992年和1993年发表的关键研究进一步推动和描绘了资源观的关键要素（Amit and Schoemaker, 1993; Kogut and Zander, 1992; Mahoney and Pandian, 1992; Peteraf, 1993）。1996年，资源观研究获得了“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年度最佳论文（Miller and Shamsie, 1996）。2001年，资源观得到广泛关注，并招来一系列批评（Priem and Butler, 2001a; Priem and Butler, 2001b）。同样在2001年，鉴于资源观研究的巨大进展，Barney（2001）等编辑